

##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4年4月16日

第227期

13



## 继承弘扬中华文化

习近平同志2013年8月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其中一个重点是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美德的传承与弘扬。在这些讲话中,他站在新的文化高度,以宏大的历史眼界,辩证地将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运用于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论述。讲话深刻肯定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对民族生存、发展、壮大的作用,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价值,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讲话还深刻肯定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对民族生存、发展、壮大的作用,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价值,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讲话还深刻肯定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对民族生存、发展、壮大的作用,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价值,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在讲话中,首先集中论述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通过对“讲清楚”的要求强调了中华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即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丰厚滋养,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与以前重在讲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为

民族发展提供精神力量不同,习近平更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关键性作用,表现了强烈的文化意识,使得民族文化问题被大大地突出出来。由于讲话不只是一要论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历史关系,而且要落实于今天的现实,所以也同时指出,中华文化就是我们在当今世界的比较优势和软实力所在,是我们在动荡世界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并进而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条件,从而确立了中华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基础的是要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

更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是,讲话明确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关系,同时也就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因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是如何确立中华民族立场、认识中华文化的意义。在十七届

六中全会报告中,开始尝试回答中华文化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如提出中华文化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华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等。讲话对此作了新的发展,按照讲话的精神,中华文化不仅是精神家园的支撑、先进文化的基础,在根本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植根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深厚历史渊源。这些思想力图理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和中华文化紧密结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确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地位。这些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指导意义。

## 中国梦与中华价值观

按照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简单地追求强国富民,而且是中华文化的繁荣复兴,内在地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梦的实

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价值理念追求仁爱、正义、大同等理想的实现,这就指出了中国梦的文化和价值内涵,把中国梦的意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价值而言,中华文化的重要性,直接体现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的问题上,其关键是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与中华美德体系的关系。按照讲话的提法,中华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精神命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必须以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基础、源泉和立足点。在这一点上,讲话提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也就是以这六条为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基本价值相对接,前者以后者为根基,使中华价值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根源。讲话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基本价值联结起来,对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讲话不仅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使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得到发展,表现了鲜明的古为今用的时代意识。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美德体系

习近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

## ■陈来

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规范、树立崇高道德理想,教育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是建设核心价值观的主战场。这是其系列讲话的基调之一。

讲话强调,中华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要善于传承中华文化的道德美德,要使每个人成为传承中华美德的主体,促进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应当说,中华美德和道德建设是讲话所关注的核心和重点。按我的理解,其中的关键是要解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承中华美德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象化实践主要有两个领域,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在道德建设上,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体现其道德的功能,就必须以中华美德的传承实践为基础、为根本。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美德必须两手一起抓,一方面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一方面要注重中华美德的传承。只有这样,“讲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实处,而不能孤立地去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在道德建设的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需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与实践为立足点、为条件,离开中华美德的传承实践去孤立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就不能体现讲话的要求和精神,不能充分实现道德建设的功能。因此,必须以讲话的精神宣传核心价值观,要通过贯彻讲话精神来整体思考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施行。在这个问题上须要转变认识,把对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中华美德关系的认识统一到讲话的精神上来。

2013年11月下旬习近平同志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到访曲阜和孔府,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选择曲阜发表有关中华文化和孔子儒学的讲话,明确强调弘扬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与价值引领方面所作的重大宣示,其意义绝不可低估。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主政者往往通过宣示对孔子的尊崇来引领风尚,改善风俗。习近平同志扬弃了古代对孔子的尊崇形式,而明确指出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儒家传世的至理名言,经过二千多年的历史检验,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在这一点上习近平的山东曲阜之行作为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实践为立足点、为条件,离开中华美德的传承实践去孤立讲社会

## 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在中国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 1935—)于1957年以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登上文坛,其后笔耕不辍,半个世纪以来创作中长短篇小说约百部(篇),另行发表了数量更多的随笔、书简、文论、讲演和对话,作品总字数逾千万字(中文)。大江健三郎借助这些作品置身于边缘,从不停歇地向权力中心提出质疑和挑战,为维护战后和平、反对复活国家主义而殚精竭虑,在日本知识界乃至世界文坛享有很高声誉。

遗憾的是,在大江获得诺奖(1994年)之前,中国大陆地区只翻译了大江第一次访华时的特约文章《新的希望的声音》(1960)以及三篇零散的短篇小说《突然变成哑巴》(1981)、《空中怪物阿贵》(1986)和《饲养》(1988)。译介的缺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的缺失,在此期间,只有王琢的《人?存在?历史?文坛——大江健三郎小说论纲》(1988)和孙树林的《大江健三郎及其早期作品》(1993)这两篇论文面世,前者概述了大江“是个举足轻重的‘先锋派’代表作家,在近30年的文坛生涯中,以锐意求新追求与世界文学同步的态势”,后者则以大江的初期作品群为分析对象,认为“大江健三郎常常走在日本文学界的最前端,用具有现代意识风格的作品去反映忧郁、烦恼、彷徨、无所依托的青年一代,深深地挖掘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人生的本质,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弊。他的作品被介绍到欧美,成为当今享有国际声誉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作家之一。然而,在我国,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翻译及研究近乎一片空白”。

及至大江获得诺奖之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方若大梦初醒,却苦于没有学术储备,仓促间发表的文章多为动态性介绍文章,这从题名上便可略见一斑,比如蒋白俊的《出人意料的大江健三郎》(1994、12)、许金龙的《超越战后文学的民主主义者——大江健三郎》(1994、12)、叶琳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荣膺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1995、1)等等。由于此时国内的大江健三郎小说中译本凤毛麟角,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文章更是寥若晨星,因而上述动态性介绍文章所依据的参考资料大多来自日本方面,少见作者本人的独到解读,只能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

在大江获得诺奖后,《外国文学动态》和《世界文学》于1995年1月分别刊载了大江健三郎的两个专辑(含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摘译、获奖讲演辞和评论文章等)、光明日报出版社则于同年5月出版了由叶涓渠主编的《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计有《个人的体验》、《万延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和《死者的奢华》),稍后,同为叶涓渠主编的两套大江健三郎丛书也相继问世,一套是作家出版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全五卷,计有《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日常生活的冒险》、《同时代的游戏》、《人的性时代》和《青年的污名》),另一套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集》(全三卷四册,计有《燃烧的绿树》上下卷、《迟到的青年》和《小说的方法》)。应该指出的是,面对解读难度极高的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作品,除王中忱等部分译者外,大多数译者并没有相应学术储备,甚至有些译者还是日语专业的在校生,这就使得这一期间的翻译水准参差不齐,部分译本多有误译和漏译之处。

同样是以这批翻译作品为分析文本,部分学者从人类困境和边缘等主题切入,比如叶继宗的《再现人类困境中的不安——大江健三郎初探》(1995、11)、王琢的《“被监禁状态”下的苦闷与不安——论大江健三郎第一阶段初期小说》(1995、12)许金龙的《超越战后文学的大江健三郎》(2001、5)等等。

由于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契机,新闻界和书刊界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关大江其人其作品的评述和翻译犹若井喷之状,显现出一派繁华景象。尽管译本的质量不尽如人意,评述亦多为动态性介绍文章,却终究彻底改变了“近乎一片空白”的尴尬处境,尤其在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获诺奖第一次以诺奖得主身份访问中国,这也是新中国迎来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大江健三郎与黄宝生、陈众议、许金龙、王中忱、于荣胜等学者和莫言、铁凝、阎连科、余华、徐坤等作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出版机构也被激发出更大热情,在其后数年间陆续翻译出版了大江的诸多小说和随笔。这一批

翻译出版的最大亮点,即在于开始出现大江当时的最新长篇小说,比如《燃烧的绿树》和《空翻》,而且翻译工作也是由郑民钦、杨伟等富力强学的学者承担,这就为学界及时提供了可以信赖的参考文本,随之出现了霍士富的《大江文学的宗教理想及其在作品的表现——试析〈燃烧的绿树〉》(2001、9)、许金龙的《一部拷问灵魂的力作——评大江健三郎新作〈空翻〉》(2003、8)等研究文章。值得关注的是,这是我们在有关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翻译和研究方面第一次勉强跟上国外同行的节奏。

有了前十年的积累,发展期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在惯性作用下,仍有诸多学者关注存在主义与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各种关联,比如安徽的《继承与超越——论大江健三郎与萨特的存在主义》(2004、3)、兰立亮的《从〈死者的奢华〉看大江健三郎对存在主义的接受和超越》(2005、2)等等,这些研究者试图从多角度论证大江健三郎小说与存在主义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个别论者甚至断言大江健三郎小说无疑是存在主义的产物。与此同时,也有少数论者在分析大江健三郎小说时,注意到存在主义与入道主义之间的关系,比如蔡志云即在《空翻》对存在主义的超越及其人道主义思想》(2006、3)一文指出“大江对存在主义的超越,表现出大江关注人类生存、追求世界和平与和谐的特殊的人道主义思想”,董晓娟更是在《“战斗的人道主义”》(2011、4)中指出,“‘战斗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了大江创作的始终”,许金龙也在《大江健三郎文学里的中国要素》一文里表示,“始自于少年时期的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使得大江不自觉地接受了鲁迅文学中包括与存在主义同质的某些因素,从而在接触了萨特以后几乎立即就自然(很可能也是必然)地接受了来自存在主义的影响。当然,在谈到这种融汇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萨特的自由选择 and 鲁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有关探索,其实都与入道主义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学生时代的大江在学习法国的中世纪经典名著《巨人传》的过程中,也从恩师渡边一夫教授那里‘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文主义

思想。顺便说一句,在法语中,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是同一个词汇——humanisme。”相较于萌发期,发展期的这一类论述显然更全面一些,部分观点更是首次提出。不过,这一时期有关存在主义的研究所参考的分析文本多为早中期旧作,未能及时消化和有效利用同期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最新译本,在相当程度上滞后于日本同行的研究,而且对入道主义/人文主义的论述也不够充分和准确。

(二)互文性在大江健三郎小说中不断呈现出新的样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大江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开始,直至最近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2013),在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鲁迅文学一直是大江健三郎创作小说时的重要资源。当然,我们在做如此评述时,同样无法忽视大江健三郎小说中来自但丁、拉伯雷、布莱克、叶芝、本雅明、艾略特、爱伦·坡、本雅明、萨特、劳里等作家、诗人和哲学家的养分,以及来自包括孟子、毛泽东等中国思想家、政治家的积极影响。

在这近十年发展期中的一个可喜现象,就是通过研读大江健三郎小说文本,中国学者不断发现其中的互文关系,其中徐■的论著《重复中包含着差异》(2011、5)注意到了大江健三郎的部分小说与其对应的西方作家或诗人,用图表列出《新人吧,醒来啊》与布莱克、《致思华年的信》与但丁、《燃烧的绿树》与叶芝、《愁容童子》与塞万提斯、《别了,我的书!》与艾略特等等对应关系。张文颖的《来自边缘的声音——莫言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2007、1),指出无论在文学理念还是写作手法上,莫言与大江健三郎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而且这些相似之处基本上都包含在边缘世界中。的确,借助莫言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位作家或夸张、或幽默、或哲理、或荒诞的描写,最为边缘的女人常常显现出极大的韧性和力量以及勇气,她们敢于与恶劣的生活环境抗争,敢于在绝境中通过反抗寻找希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甚或颠覆中心和权力,试图创造出更具人性的新宇宙。也正正是因为这种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共鸣和契合,大江才在不同场合表示“很长时间以来,莫言先生一直是

## ■许金龙

我予以高度评价的、世界文学的当代作家”,表示“莫言先生的小说经常会给人很光明、向着希望前进的感觉。我觉得饱尝对人的信任这一点是我们文学的首要任务,而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进则是文学的使命”。

此类中国视角的论文还有杨玉珍的《论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以河流/森林为表征》(2006、9)、刘东明的《再观生存困境的思索者——大江健三郎与大江健三郎新近创作的所有小说和部分随笔都能在第一时间内翻译并出版,比如《奇怪的二配》(全三卷,包括《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别了,我的书!》)、《二百年的孩子》、《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水死》等长篇小说(其中《别了,我的书!》中译本获得鲁迅文学奖优秀作品奖)、以及《在自己的树下》、《宽松的纽带》、《康复的家庭》、《致新人》、《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读书人》等长篇随笔,无论是翻译种类之多还是出版速度之快,都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基本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速度同步,以至大江本人感叹道:“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首先始于英译、法译,还有德译,而现在,则被最迅速、最全面地翻译成中文,我对此感到幸福和光荣。”在这种背景下,以大江健三郎最新小说为分析对象的学术文章的篇数也大幅上升,比如许金龙的《“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解读大江健三郎新作《被偷换的孩子》》(2004、2)、《发出边缘的呐喊——再谈〈愁容童子〉》(2005、11)和《“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2005、8)以及

《盘旋在废墟上的天使》(2006、9)、张景韬的《大江健三郎封笔之作〈别了,我的书!〉》(2006、10)等等。多视角和多维度的论述,在改变中国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的严重滞后局面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使其大致可与日本学界保持同步,尤其在《水死》研究的个别领域甚至遥遥领先。在日本保守势力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侵蚀战后民主主义成果并快速复活国家主义的当下,大江健三郎借助《水死》以及《晚年样式集》等系列小说作品不断在绝望中发出含着希望的呐喊,中国学者对大江健三郎小说文本中的这声呐喊进行深度解读,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在传达令世人振奋发聩的警示。

发展期内还有一个新变化——大江健三郎应邀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之后,外文所近年来不定期在北京、台北和东京等地举办了大江健三郎文学研讨会,邀请大江健三郎本人和台海两岸部分作家以及多语种文学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这其中的多数论文以大江的最新译本为分析文本,比如有陈众议的《童心新说——评〈愁容童子〉与〈堂吉珂德〉及其他》、《真实与虚构——大江文学想象力刍议》和《逆水行舟——大江文学思想溯源》、莫言的《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叶涓渠的《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阎连科的《“大江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几点启示——在中国“大江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吴岳添的《大江健三郎——当代杰出的人道主义作家》、李永平的《回归与拯救》、《反抗中的希望》和《历史忧思与启蒙的冒险》、陆建德的《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和《诗与社会——略谈大江健三郎与威廉·布莱克》等等。上述拥有西葡拉美文学、日本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比较文学、哲学、美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和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成功地对大江健三郎小说的不同侧面做出了独特解读。他们在为不同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贡献一批高质量论文的同时,也隐然成为这个研究群体中可以期待的一支优秀团队。